

評林大著

宋光宇

「中國歷史疆域古今對照圖說」

書名：中國歷史疆域古今對照圖說

作者：樊開印

出版：徐氏基金會

時間：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三十日

頁數：八開本，一三八頁，古今對照地圖三十幅

讀史書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本地圖放在手邊，隨時查閱，才能明瞭史書所記地點的方位，從而明瞭當時的形勢。甚至，有人主張要把一幅幅的地圖記入腦海中，每讀到一處地名時，在腦海中能够立即浮現出那個地名以及相關位置。

我國是個重視歷史的國家，自然連帶着注重有關的圖籍。顧祖禹就說：「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絕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便；不綜原委，無以識形勢之全。」因而，有關歷代地名和地圖的研究工作，自古就受到重視。我國有關這方面的專著，最早的應當推漢代應劭的「地理風俗記」，對秦漢時代及以前的地名做番說明。晉代的裴秀創立「製圖六法」，成為以後各代輿圖繪製的基本準則。隋代有「區宇圖志」、唐代有「括地志」，只可惜不傳於今世。唐代李吉甫著有「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樂史著「太平寰宇記」，則為私家著述。它的缺點，如顧祖禹所評，考據不精。元代有「大一統志」，迄今僅剩殘本。明代郭子章編著「郡縣釋名」廿六卷，王應麟編著「通鑑地理通釋」，而顧祖禹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尤為曠世鉅著，被譽為千古未有

的奇書。然而，他對繪製地圖一事，沒有創新改革，仍循裴秀所立的繪圖六法。清代官修「大清一統志」時，曾經延用西洋傳教士擔任實際測繪工作，不過未能盡採西洋繪製地圖的長處。清末地理名家楊守敬作「歷代輿地沿革圖」時，依然採用中國傳統方法。

民國以來，在地圖繪製方面，完全採用了近世西洋的繪圖方法，是項進步。民國十八年臧勵齋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印行），收羅地名三萬七千條。民國四十九年，陳正祥做續編，增補地名二千五百八十條。程光裕、徐聖謨兩氏於民國四十四年出版「中國歷史地圖集」上下兩冊，為張其昀主編的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三輯。

日本人研究中國古今地理而有成就的，計有：箭內互的「東洋讀史地圖」，一九一二年初版問世；青山定男編「讀史方輿紀要索引——支那歷代地名要覽」，一九三三年出版；松田壽男與森鹿三合編「亞細亞歷史地圖」，一九六六年出版。

德國柏林大學的歷史地理教授 Albert Herrmann 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Ah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哈佛燕京社專書系列的第一卷）。

用中國傳統繪圖方法繪製的地圖不易與現代繪圖法所製的地圖對照，暫且不論。二十世紀以來所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大都失之於簡略。箭內互的「東洋讀史地圖」（國內三人行出版社加以編譯出版，更名「中國歷史地圖」）是目前大專院校歷史系師生用得最多的一本歷史地圖，無奈它只指明了某個朝代的疆域輪廓，至於內部詳情則沒有提及。因此，箭內互的「東洋讀史地圖」是讀「中國通史」時用的，不適用於專史或專題的研究。松田壽男與森鹿三的「亞細亞歷史地圖」以及 Herrmann 的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也有同樣的毛病。

除了「簡略」這個缺陷外，這幾份歷史地圖的另個缺點則是無法與現今地名聯貫起來。程光裕和徐聖謨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就針對以上兩項缺點而加以改進。以現今中國地圖為底，用綠色印刷，把某個朝代的疆域和重要地名，用黑色直接印在上面。讓讀者能够古今對照。它的下冊即是文字部份，對各地地名有所說明。

「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有其缺點。書太小，廿四開本，縮小地圖後，上面的字就小得難以辨認；現代

中國地圖用綠色印刷，與黑色的歷史地圖重疊後，更顯得模糊。同時基於有底圖的關係，歷史地圖只能擇要繪出，不能詳細，否則在畫面上更加難以看清楚。

樊著「中國歷史疆域古今對照圖說」的最大長處，就是針對程、徐兩氏「中國歷史地圖集」各幅地圖的缺點，加以改進。一方面放大為八開本，一方面把歷史地圖和現代中國地圖分開。將現代中國地圖用透明紙印刷。兩相對照。古今地名的位置，清清楚楚的顯示出來。如是，歷史地圖可以詳盡的把某個朝代的前兩級地方行政制度標示出來。這是個很好、很有貢獻的創意。對於讀史書有莫大的幫助，尤對需要詳細地圖以為參照的學者而言，方便太多。樊君能有此創意，當該歸功於他為軍官時所做各種參謀作業時透明圖的啓示。

「中國歷史疆域古今對照圖說」並且對各代歷史和各代地名做了一番說明和考證。

在各代歷史概況敘說部份，固然改正了其他歷史地圖的缺點——說明過於簡略，可是也暴露了作者的短處——對中國上古史部份的認識侷限於傳統說法，無法兼顧近幾十年來，各家新說和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把中國的起源，一切都歸根於黃帝，是乾、嘉以降所謂正統儒家的一貫說法。三百年來，一直支配着我國學術界對上古史的認識。這種說法的好處是清晰的說明了上古各個朝代彼此間的關係，含有極為濃厚的「家天下」思想。在這種家天下的政治局勢中，偶而有人「傳賢不傳子」，就顯得很特殊，「禪讓」政治也就成了千古美談。

正因爲這種傳統說法過份乾淨，才引起近世學者的懷疑和辨古。不過古籍也留給我們一些與正統說法相反的資料，諸如：「紂征東夷三年而隕其身」、「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竹書紀年上有關啓與有扈氏、伯益的爭位、太甲與伊尹的爭戰……等。這些資料正提供重新考慮中國上古史的線索。

光緒廿四年，甲骨文首度爲學者所認識，引起一股蒐集、研究的熱潮。民國十年北平地質調查所的工程師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河南省滎池縣的仰韶村，大規模發掘村南的史前遺址，得到大批彩色陶片，名爲「仰韶文化」。民國十五年十月廿六日，在北平舉行爲歡迎瑞典皇太子來訪的學術講演

會，最後由安特生主講，在他講演的末尾，用幻燈片發表了師丹斯基博士在周口店發掘出來人形的牙齒，證明了舒羅塞氏廿三年前(一九〇三)的研究結論，遠東確有有期人類存在的殘骸留存後世，這就是「北京人」爲世人所知的緣起，並且指明出土化石的地點在離北平不遠的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次年，在丁文江的領導下，由國際合作方式，在周口店從事發掘工作。

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傅斯年、董作賓、李濟諸先生的主持下，展開爲期十年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樊著第一頁誤把年代寫成民國十九年)。透過這項發掘工作，讓世人真確的看到殷商王朝的遺物，民國十九年，中研院史語所吳金鼎在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發掘史前遺址，此遺址以一種薄如蛋殼、黑而發亮的陶片爲主要特色，名之爲「龍山文化」。

抗戰軍興，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停止。抗戰勝利以後，又是剿匪戰役，以致大陸淪陷，政府遷臺。留在大陸的考古學家，繼續從事發掘工作；來到臺灣的考古學家一方面整理安陽發掘資料，一方面從事實

地發掘工作。

幾十年來，考古發掘工作所顯示的成果，是讓世人對霧樣的上古中國有了較清楚的認識。這種認識可以補足以往所說的上古中國的不足。

如今舉世學者都承認：距今六十萬至二十萬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 如藍田人、北京人)已經生存於華北地區，以漁獵採集為生，洞穴居處，使用粗略打製而成的石器，並且知道用火。北京人的「箕形門齒」這項體質特徵，至今仍以黃種人的出現頻率最高(這種現象並不能肯定今日的黃種人就是北京人的後裔，因為兩者之間不是同屬一個 *species*，生物學肯定不同的 *species* 之間不能繁殖後代，我們只能說，北京人生理特徵中的某項基因至今仍留存於黃種人的基因庫(*gone pool*)之中)

人種慢慢的演化，從南方猿人——直立人——尼安德塔人——現生人種 *Homo sapiens*，其間歷經了三百萬年。距今二十萬年前，出現尼安德塔種人。中國境內，屬於這個種的化石人計有：湖北長陽人、廣東馬壩人，廣西柳江人等等。距今五萬年至三萬年前，尼安德塔人快速的向另一個新的人種 *Homo*

sapiens 演化，在中東地區已經找到清晰的演化過程中的各階段資料。中國境內則尚未找到。距今三萬年前，第四冰期末葉嚴寒氣候中，今日如你我般的 *Homo sapiens* 正式出現。周口店上洞所發現的「山頂洞人」正是現生人種初現時的人類遺骸。

距今一萬年前或更晚，人類學會了農耕種植和畜養動物進入新石器時代。華北是世界上農業起源地之一，以小米為主要作物。在華北，新石器時代的代表就是仰韶文化。人們用游耕方式種植小米，使用繩紋陶，有一部份陶器有彩繪，定居成村落，房屋是半地下居方式。在淮河下游和東南沿海一帶則有青蓮崗文化，在臺灣有大坌坑文化。都與仰韶文化有類似之處：如紅陶、彩陶、三足器和石刀。

以前的學者認為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是兩個並存對立的文​​化，仰韶在西部山區，龍山在東部濱海區以平漢鐵路沿線為分界。現在的學者根據廟底溝遺址和其他遺址，認定兩者是前後關係。張光直(*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77 Table 8)就列表說明這項層位關係。

		地層年代					
東南沿海	浙北	蘇北	山東	河南	陝西	湖北	區位
曇石山文化	湖熟文化	商代文化	商代文化	商代文化	西周文化	商代文化	1850 B.C.
鳳鼻頭文化	良渚文化	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	陝西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	2500 B.C.
	北陰陽營文化	華亭文化	廟底溝Ⅱ文化	廟底溝Ⅱ文化	廟底溝Ⅱ文化	屈家嶺文化	3200 B.C.
大岔坑文化	馬家濱文化	青蓮崗文化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	4500 B.C.
↑			↑	↑	↑		

龍山文化已是殷商文化的礎石。有卜骨、有城牆、聚落固定而且巨大、有祖先崇拜，往後中華文化的基本特質，都在這個階段有長足的發展。在許多遺址的層位上顯示，殷商文化緊緊壓在龍山文化之上。可見殷商文化直接承襲自龍山文化，而成爲光芒萬丈的青銅文明。

文獻材料固然有不足採信之處，但它總是有其存在的價值，不容一筆抹煞。地下材料雖然是千真萬確

，若無文字伴隨，則無法印證文獻材料的記載。商代因有實物和甲骨文已證明它真實不虛，那麼夏代呢？夏以前的各代政治勢力呢？都成了迷團。還有待往後考古學家的努力。夏代既然是屬傳說時代，那麼夏代的疆域也就成了傳說中的疆域，與其肯定的指明經界，我個人認爲倒不如說是「勢力所及的範圍」來得恰當。

有關禹的神話傳說特別多，北至匈奴，南迄百越

都說是禹後，而龍門、會稽的禹跡，尤爲著名，卽連自古不通中國的蜀人，也有治水傳說

就以「夏禹大會諸侯於會稽」一說而論，似乎不必硬性說那時的會稽就是今日浙江省會稽縣。古代所說的會稽，可能是如「揚州」一般，是種泛稱，泛指當時的南方，我也懷疑此說的正確性。我之如此考慮，是根據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而來。傅先生在此文中，根據左傳、國語、詩經、史記、戰國策等有關禹的記載，推測夏代的區域包括今日山西南半，卽汾水流域，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卽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陝西一部份，卽渭水下游地區。東方的界線，最盛時曾有濟水上游。商丘就成了最前線地區。傅先生說夏之南疆不易確定，推論諸夏未必能過荊襄而括江漢。若傅先生的說法可信，禹就未曾到過長江下游。同時，若再考慮古代的氣候狀況，地理形勢和交通工具，實不敢想像禹如何以山區民族身份來渡越長江淮水。乘舟畢竟是南方水鄉澤國的專利。

樊著繪夏代地圖是根據尚書禹貢。雖然，在一開始就大略說明禹貢是春秋末期，戰國以前的作品。但據此而說夏代疆域就是如此，就犯了考據不詳的輕率

毛病。

對於商代的疆域，樊著亦有問題。樊著認爲商代的疆域：

商代的疆域較夏代爲廣，西面有寧夏、甘肅、青海、四川或更西的羌族；南面有湖南、江西、浙江；北面有綏遠、熱河的南部；東面有遼寧、吉林、安東及朝鮮北部。

樊著所勾勒的商代疆域太大了，不知他是根據什麼樣的證據說的。考古遺址資料已經顯示在陝西省境內已少有商人的文化遺跡，如張光直所說（見前表）。董作賓根據殷墟一窖完整無缺的甲骨文，整理出「殷曆譜」，這些資料見商紂王晚年領兵討伐東夷的記錄，剛好印證「紂征東夷三年而隕其身」的說法。董先生考訂紂王用兵路線是在今日淮水流域，可見商代末年其勢力頂多到淮水流域。屈萬里先生在論禹貢著成年代一文也說，殷商的疆域，南面剛過黃河，北面只到山西的中部而稍北，西面約到洛水流域（陝西東部的洛水），東面接近山東半島，東南方較遠，已到淮水北岸。這樣的幅員與詩商頌玄鳥所說「景員維河」大致相似。實在很小。

或許樊君被「羌方」一詞所惑，誤把「羌方」當成漢代以降的「羌人」「西羌」。甲骨文中經常出現「羌方」「羌人」，依甲骨文所說，羌人是殷人的死仇大敵，作戰時所擄得的羌人，都用來祭祀祖先。羌人的地位有如牛羊。羌方即是姜族，而姜族是在今日山西境內汾水流域，姬姓周人是在渭水流域。商周的征戰，就成了殷人的死對頭羌方，以姜太公爲領袖，聯合了在渭水流域的周人以文王、武王爲領袖，共同舉兵滅了文化程度高出他們甚多的殷商，並且完全承襲了殷商文明。姬姜二姓往後世代通婚，以鞏固彼此的合作。

至於「羌方」是否就是後來的「羌人」，中間有許多「失落環結」存在。漢代以後的羌人，是屬藏人系統。藏人與漢人（華夏民族）共屬「漢藏語族」。語言上有同源關係。在體質上也多相似之處。芮逸夫先生在講中國民族志的時候，認爲在中國古代有的「羌民族」，分佈在今陝晉及以西一帶，爾後向西向南遷徙，分散成爲羌人、藏人和西南地區的各民族。樊君不查此中原委，逕自肯定商代的「羌方」即今日的「西羌」，以致把商代疆域向西推展到甘肅、青海，

與事實有了相當大的出入。

樊君在夏、商兩代地名考釋，都把「鳴条」斷在今河北省長垣縣西南五十里鳴条亭，與一般的說法不同。茲就手頭的資料，試著檢覈一番：

- 1、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鳴条，在今山西安邑縣北，與夏縣接界，一名高侯原。
 - 2、辭源：鳴条，古地名，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条崗，成湯敗桀之處。
 - 3、辭海：鳴条，古地名。書序：「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条之野。」按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条崗，即其地，一名高侯原。
 - 4、中國歷代地名要覽：鳴条岡，山西省運城縣北三十里。
 - 5、史記地名考：太平御覽八二，引許慎淮南注，鳴条，在今陳留平邱。尚書疏陳留平邱有鳴条亭是也。桀敗於有娥之虛，奔於鳴条，在此爲合。又舊說昆吾，夏桀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宅，舊許亦與陳留、平邱接壤。
- 以上五家說法，其中一至四說，皆主在今山西省；唯有錢穆（賓四）先生所著之「史記地名考」主張

在陳留平邱。

商的發源地，依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所證，當發跡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之地。依甲骨文的資料，則商代的疆域在今河北省南部與河南省北部、東部。確知商代是個「東夷」政權。再看成湯伐桀鳴條之戰各有關地名，計有：有娥之虛（今山東曹縣北十八里）、葛（今河南省寧陵縣北十五里）、韋（今河南省滑縣東南五十里）、顧（今山東省范縣東南五十里顧城）、昆吾（今河北省濮陽縣東二十里）、三饒（今山東省定陶縣西南接曹縣界）等等。這些相關的地名均在山東、河南、河北三省的毗鄰地帶。陳留，即今日河南省陳留縣；平邱，在今河北省長垣縣西南五十里。不獨與上述各有關地點相連接，而且當時都在黃河之南。同時，再徵諸前述夏代疆域範圍，更有理由相信鳴條不在山西。所以樊君從錢穆之說，推斷鳴條即今日河北省長垣縣西南五十里之鳴條亭，甚為合理。只可惜，樊君沒有把其中的推論證據用附註的方式寫出來，只有結論刊布，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

樊君這種只寫結論，不說明推論考證資料的情形

，不止一處。又如：秦代所置郡數為四十二郡，也是需要說明之處。

秦代所置的郡數，自古及今，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秦始皇廿六年初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又於三十六郡之外，以京師咸陽之地為內史。這個說法是依照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來。可是，劉宋裴駟作「史記集解」時，却說是含內史共三十六郡，就相差一郡。史記未曾詳列三十六郡的名稱，而漢書地理志敘述這卅六郡時又不甚詳備，才造成後代學者聚訟紛紜的局面。

清代學者關於三十六郡的研究考證，首推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最為允當。近世錢穆先生作「秦三十六郡考補」，稍為修正全氏之說，以閩中郡易東海郡。至是三十六郡的名稱與建置年代，方成定論。

漢書地理志所載的三十六郡當中，少了楚郡、黔中、閩中、廣陽諸郡，而多了九原、南海、桂林、象郡。依照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南越傳所記，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始皇三十三年平定南越以後所建置的。因此，始皇二十六年的三十六郡，不應包括這三郡。

漢書地理志的錯誤至明。劉宋裴駟作「史記集解」時，就不從漢書之說，而根據後漢書郡國志，除去南海、桂林、象郡，補以鄣郡、黔中、內史。裴駟的說法爲唐房玄齡等所編晉書地理志所採用，以爲秦始皇廿六年有三十六郡，三十三年平南越，置南海、桂林、象郡，又取閩中以爲郡，合爲四十郡。以後的巨著如通典、通考、讀史方輿紀要等都依照此說。清代中葉以後，始有人懷疑這樣的說法。以爲秦郡當不止四十，還有東海（鄒）郡。其後考據學勃興，於是衆說紛紜，全無定論。全祖望著「漢書地理志稽疑」，認爲秦始皇廿六年的三十六郡，應該從漢書地理志中減去南海、桂林、象郡，補上東海郡（見於漢志本注）、黔中、楚郡（皆見於史記）及廣陽（見於水經澤水注），廿六年以後，又增設南海、桂林、象郡、九原、閩中，合內史，共四十二郡。這樣的說法比較適當，爲後世所採信。錢穆因閩中郡建於始皇廿五年，東海郡建於始皇卅五年，認爲原三十六郡中應當包括閩中郡，而不是東海郡。

關於秦之郡數，還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清代錢大昕和他的子弟輩，主張只有三十六郡，完全依照漢

書的記載。民國王國維著「秦郡考」（觀堂集林卷十二），認爲當有四十八郡。除了無內史並以楚郡爲陳郡外，另增定陶、河間、膠東、膠西、濟北、博陽、城陽等七郡。此七郡中，惟獨河間郡在河北省，其餘六郡都在今山東省境內。他所持的理由是：「秦以水德王，故數以六爲紀。二十六年始分天下爲卅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數也。次當增置燕齊六郡，爲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於六數不足爲二，則又於內地分置陳、東海二郡，共爲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秦制然也。」但學者多不承認這種說法。

勞榘先生著「秦郡的建置及其與漢郡的比較」一文（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將廣陽去掉，補以河內郡。勞先生認爲東海郡見於漢志本注；黔中、楚郡見於史記，獨廣陽見於晚出之水經注。他於是主張「爲謹慎起見，只宜以史記漢書爲斷。」因此，以河內易廣陽。不過史記將河內與安邑同列，是地名，沒指明它是郡名，所以秦代河內郡尚待確定。

譚季龍和楊子六（見楊：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劃

()則主張秦始皇廿六年有三十五郡，去東海，補閩中，外加南海、桂林、象郡、九原、東海、常山、河內、濟北、膠東、衡山、內史等十一郡，共四十七郡。

樊君在敘述歷史地理之餘，也稍稍涉及歷史觀。

在敘述三國時代時(第三十三頁)，特別就三國演義所提出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觀念，加以討論。樊君不同意這種宿命論式的看法。他認為：「分」是中國歷史規律的「變態」；「合」才是「常態」。並舉出上古時代，在禹時萬國，周初千餘，春秋百餘，戰國七雄，一統於秦，是「合」不是「分」。秦以後，如三國、南北朝、五代等紛亂時代，總共不過三八五年，比起五千年中華歷史來，顯得微不足道。樊君認為當是「治」「亂」問題。可惜他未能就治亂問題有所發揮。

這方面的問題，歷來有不少的討論。譬如：胡適先生在「中國傳統與未來」(一九六〇)一文曾把中國歷史分成幾個大的階段：

1、上古「中國教」(Sinicism)時代：商代至西周。

2、中國固有哲學思想的「經典時代」：春秋戰

國

3、兩千年前大一統帝國時代：秦、兩漢。

4、印度佛教傳入，使中國佛教化幾達千年之久：魏晉至明清。

5、中國本土對佛教的一連串反抗：道教勃興與禪宗興起。

6、文藝復興時代：詩詞、戲曲、小說、考據、白話文。

胡適是從文化特色來分中國歷史階段，說明中國文化經過幾次的變動，吸收外來文化，加以消化吸收，最後產生一個新的綜合結晶體。

已故的中研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在「戰國以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周期」(一九三一)一文，把中國自秦到民國的歷史，分成三個週期，每個週期為時八百年，每個週期有七個治亂交替階段，如下表所示：

亂 形	治／循環週 情／期		
	一	二	三
亂 1	楚漢相爭	隋末羣雄	靖難之變

治	文景、武昭、宣	貞觀、永徽、開元	明代前期(太祖——孝宗)
亂 2	王莽篡漢	安史之亂	明末流寇
治	明章之治	德宗中興	康雍乾三朝
亂 3	黃巾三國	黃巢之亂	洪楊之亂
治	西晉統一	北宋	同治光緒
亂 4	八王之亂	靖康之難	民國軍閥混戰
治	晉室南遷	南宋偏安	
亂 5	淝水之戰	蒙古南侵	
治	東晉偏安	宋與蒙古對峙	
亂 6	南北朝開始	蒙古南征	
治	南北對峙	元代統一	
亂 7	北周滅北齊	元末羣雄	
治	隋統一天下	明統一天下	

故清華大學教授雷海宗在「中國史與世界史上的週期現象」(Periodization: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一九三八)一文中，把中國歷史現象分成兩個大的循環週期。第一個週期，稱之為「古典中國」，從上古到淝水之戰(西元三八三

年)。這個週期內，種族相當純粹，文化是土生土長的，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與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相同情形。第二個循環週期，是從淝水之戰到現在。中國一再被北方民族征服，原有的文化受到佛教的影響而逐漸改變，表現出非常濃厚的外來文化氣息，雷氏稱之為「韃靼佛教中國」(Tartar-Buddhist China)，是中國所獨有的。

無論是治亂或分合，都是表面的現象。重要的是導致分合治亂是些什麼樣的動力，以及在治亂分合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意義。若分成許多單項變數來看，更可以清楚表示該項變數所具有的功能。譬如說：軍隊為政府所控制，如古代兵農合一、隋唐府兵、宋代禁軍、明代衛所、清代八旗綠營，以及目前我國所行征兵制，軍隊成為統一全國的支柱，於是全國統一，表現出合與治；若一旦軍隊改為私人所有，立刻會造成割據分崩局面，如東漢末年、唐代藩鎮、民國初年，就表現出分與亂。

再就土地、人口關係而論，也與治亂分合有關。土地多，人口少，就不易發生變亂；人口多，土地不夠分配，生產不够所需，就會引起社會不安。這個現

象很能符合自然界的平衡律。於是安定與動亂，隨着人口、土地兩變數的變動，而循環出現。

所謂「治」，一定是一套政治體制能够有效運作的時候，也就是發揮平常功能的時候；隨着時日的推移，社會上產生新的情況，而原有政治體制因日久而僵化，應付不了新的局面，於是就要求變，往往就形成「亂」象。就此角度來說，亂世應當與治世等量齊觀，不該視之為異象。許多新制度的形成，就是在亂的時候，經過一段實驗時日，新的制度正式取代原有制度。

其他如胡人南下，佛教傳入等等因素，也都有它的作用。總之，這些都是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無所謂常態與變態。

樊著「中國歷史疆域古今對照圖說」由於有透明現代中國地圖對照，以及有詳足的說明，使一般讀者可以很方便的查閱，並且能對中國歷代地方行政體系的沿革，有清楚的認識。當然，任何書都有瑕疵，本書的瑕疵已如前述。倘若能做補充，並加強在地圖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標示，那就更完美了。

探索文學，即在探索人的心靈勝境，歷遍千山萬水，有時亦不如一睹人的胸中丘壑。下面五種書是別具一格的文學的觀光指南，帶你一窺當代所有著名作家的藝術堂奧，是國內最實際的批評文集：

- | | | |
|---------|---------|-------|
| 一、文學探索 | 林柏燕 著 | 五十元 |
| 二、書評與文評 | 思 兼 著 | 五十元 |
| 三、橄欖樹 | 周 寧 著 | 五十元 |
| 四、第三隻眼 | 田夏仁等著 | 四十五元 |
| 五、文學評論 | 第三集（平） | 110元 |
| | 四、五集（平） | 各100元 |

各書直購九折，訂戶八折。
請劃撥一九二七四本社帳戶。